

北京图书馆藏

42867

中文资料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九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五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程昭旗校

中 华 书 局

1980年3月

1228
13
225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九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五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瞿昭旗校

(征 求 意 见 稿)

中 华 书 局

1980年3月

A 791536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九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五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书店代发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1980年8月印刷 定价 0.90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目 录

达赖喇嘛 (十三世)	(1)
德 王	(8)
范源濂	(12)
费孝通	(14)
冯承钧	(17)
冯 至	(20)
冯国璋	(23)
丰子恺	(28)
冯自由	(30)
冯友兰	(33)
冯玉祥	(38)
傅斯年	(46)
傅增湘	(49)
傅作义	(50)
韩复榘	(56)
何成浚	(58)
何 键	(62)
贺衷寒	(66)
何香凝	(70)
何 东	(72)
贺耀组	(74)

何应钦	(77)
侯德榜	(83)
萧佛成	(85)
萧同兹	(87)
谢 持	(89)
谢洪赉	(92)
谢冰莹	(94)
谢婉莹	(96)
熊佛西	(99)
熊希龄	(101)
熊克武	(103)
熊式辉	(106)
熊十力	(110)
徐 谦	(112)
徐志摩	(117)
许崇智	(120)
徐新六	(123)
许广平	(125)
徐 謨	(126)
徐悲鸿	(128)
徐世昌	(131)
许世英	(135)
徐树铮	(139)

达赖喇嘛（十三世）

藏名：阿旺罗桑图登嘉措

达赖喇嘛（1876.6.26——1933.11.17），西藏的政教首领。他以改革西藏的政治经济，力求使西藏独立而闻名。

达赖出身在西藏东南部达布省的一个荒僻地区，有兄弟数人，上有三兄。他两岁时被带去拉萨，按旧例应由在拉萨的清廷驻藏大臣从金瓶掣出达赖喇嘛的名签以确定名分，这次未按此法办理，不过这得到清朝皇帝许可。这一破例的确定名分为日后拉萨与北京关系上的不祥之兆。清政府在十八世纪将西藏列为藩属后一直奉行闭关政策。达赖三岁时，母亲去世，他父亲贡格仁钦作为达赖的近亲住在拉萨，理所当然地在西藏（喀厦）政府中享有特别尊敬和政治地位。在他未成年时期由摄政代行职权。

达赖十八岁到坐堂之年时，一次神示揭露，在给达赖穿的靴底中藏有杀害他的魔符，此符用来召邪神毁灭穿靴者。摄政与首相均被捕下狱。

1895年，达赖二十岁亲政，以“西藏护神菩提萨埵”身分亲政。达赖十三世是十九世纪第一个亲政的达赖喇嘛，以前的达赖喇嘛都在未成年时就死去，由摄政掌权。面临着过去的摄政为首的丹吉林寺和哲蚌寺争权斗争，他马上树立了他的权威。

1879年达赖喇嘛确定名分时，忽视驻藏大臣的大权，表示拉萨向清朝皇帝的初步挑战。1890年，清政府于锡金，西藏划定边界会议中承认邻邦锡金的保护。1893年中英签订一项关于通过春丕谷的印藏贸易协定，规定在亚东开辟商埠。1895年达赖十三世掌权的那一年，中国被日本战败，西藏对北京政府的宗主权更加轻视。西藏政府不承认没有西藏参加的中英各项协定，严拒英人开辟通商路线及调整与西藏关系的行动。

达赖喇嘛的抗拒立场得到一个名德尔智的布里雅特蒙古人的支持，此人以德尔杰也夫之名作为布里雅特蒙古人所知。德尔智系俄发，1880年来藏，在哲蚌寺以精研佛学闻名，成为达赖的导师之一，是深得信任的顾问。1898年回俄国

为喇嘛教筹款。圣彼得堡当局得知他的来意后任命他为驻拉萨代表，德尔智带着送给各大寺院的款项和礼物回到拉萨。德尔智劝达赖向俄国求助。1901年达赖遣使去圣彼得堡，与尼古拉二世朝廷取得联系。此时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由北京出走，满洲为俄军占领，形势有利于实现达赖谋求脱离中国的希望。

清朝驻藏大臣强烈反对藏俄之间签订任何条约。德尔智着手在英藏关系上制造危机，以便使西藏倾向俄国。英国对俄国扩张的恐惧日增，印度英总督奎松认为俄国势力如在西藏确立，必将渗入喜马拉雅山麓诸国并危及印度本身。达赖的顽强态度，德尔智的阴谋策划，英国的疑虑重重，最后英国派遣了一支由荣赫鹏率领的八千人远征军。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要迫使达赖执行1873年中英商务协定的条款，并对预期的俄国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

1904年3月，当英藏双方在贸易中心地江孜交战时，俄国因忙于日俄战争，无暇顾及西藏形势。月终，英军迫近拉萨，达赖在德尔智陪同下流亡外蒙。1904年9月，喀厦政府被迫签订条约，西藏实际上沦于被保护地位。荣赫鹏条约后虽曾修改，但条约的签订削弱了达赖的权势。北京政府因达赖已逃离拉萨，召命班禅九世执政，班禅并未受命，在达赖出走期间，一般听命于清廷。

达赖仓促从拉萨出走，他仍以不失其身份的方式旅行，他带着随行人员约七百人于1904年11月到库伦（乌兰巴托）。他的东道主人是蒙古喇嘛教的大喇嘛，库伦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达赖在库伦时，经德尔智和沙皇联系，企图谋取俄国对西藏独立运动的支持。

1906年，达赖离库伦回到西藏东北的青海湖，住在一所喇嘛庙。达赖不在西藏期间，他要想从俄国方面取得援助对抗英国和清廷的希望日益减少。同年，中英新约重申，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1907年8月，英俄签订一项总约，俄国同意不干涉西藏政治事务，并承认英国在“保持西藏对外关系的现状上的特殊利益”。

尽管形势的发展不很有利，但达赖仍力求扩大西藏脱离中国的独立地位。1907年7月，清廷邀请他，召他去北京，但他却去山西五台山圣地了，1908年春抵达该地。1908年8月，清廷下令改革西藏内政，达赖仍在五台山逗留数月

之久，常常有来自北京的外交官员前往访问。1908年9月20日，达赖到北京，正在光绪、慈禧临死前一个月觐见了这两位清廷统治者。清廷册封达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借此表明清廷对达赖的态度，达赖无意接受此封号顺从清廷。达赖在北京时，俄、英、美、日各国使臣曾来探望。在会晤英使朱尔典时，达赖表示印藏和睦相处的愿望。由于朱尔典曾表示将大力满足达赖的要求，于是他希望取得支持以对抗汉族因而转向英国。美国使臣柔克义所撰《拉萨的达赖喇嘛》一文详述达赖在北京时的情况，此文发表于1910年的汉学期刊《通报》。

1908年12月21日达赖离京回拉萨。那时，清廷已派军入藏。中国将军赵尔丰，赵尔巽之弟，攻占巴东作为进入西藏东部的据点。达赖一行西返途中，清军更深入西藏。1909年12月，达赖到拉萨，一月后，赵尔丰的军队也到了拉萨。清军兵临拉萨城下时，达赖通过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与清廷商定一项协议。由于他对清廷的意图心怀疑惧，他决定再度由他的都城出走。1910年2月25日，由德尔智陪同离开拉萨。

达赖逃走，清廷下令宣布废黜其西藏统治者的职务。北京再一次要求班禅出来行使达赖的职权，为班禅所拒。

达赖一行取道锡金的大吉岭前往印度。负责印度政府与锡金、不丹、西藏的关系的英国官员贝尔与达赖会见。达赖表示此来目的是寻求英国援助抗击清廷。1910年3月他去加尔各答，与印度总督明托勋爵讨论中国通过西藏对印度北部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诸邦的潜在威胁。但是1906年的中英条约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1907年英俄协定规定双方均不得干预西藏内政。英国当时的政策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但决不容许中国干涉尼泊尔、锡金、不丹。达赖及其政府在印藏边境的两年多期间内，贝尔和他相处极好，常有私人会谈。

达赖未能取得英国的积极援助，转而求助于尼泊尔。他又向俄国请求援助，所得答复却是通过英国政府转交，这使他深为沮丧。俄国的答覆和英国、尼泊尔的一样，含糊其词。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不久前对西藏取得的控制化为泡影。拉萨驻军发生兵变，杀死军官，在市内抢掠。清朝推翻后，1912年6月，达赖从噶

仓堡回西藏，因汉族军队仍占据拉萨而未能进城。1912年7月，北京袁世凯政府由四川派军队去拉萨替换原驻军，因为英国进行干涉，才终止了对西藏的占领，原驻军队取道印度撤回，1913年1月，达赖回拉萨。过去九年中，达赖在西藏的时间仅仅两个月而已。

达赖决心驱除西藏的汉族势力。1912年7月，派德尔智回库伦与外蒙商订条约，1913年1月，与库伦活佛订约，双方互相承认独立。达赖以中国不能保护西藏免受外国侵略为理由宣布独立。当袁世凯通知他已恢复他的尊号时，达赖声称他准备在西藏行使政教两方面的权力，不需要中国政府的职位。1913年所派的新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无法进藏，滞留在印度。

达赖用他的名义封官授爵，过去这是必须经清帝批准的。他还开始以藏族的名义宣称西藏应该在国际上占有自己的新地位。那时北京政府想占领西藏东部来维护它的权力。而英国政府为了稳定局势，确保其在西藏的利益，1913年英国政府召开由英、中、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达赖的代表强烈要求事实上的西藏独立，并恢复原有疆界。1914年4月，三方代表同意：西藏分为内藏（或东藏）外藏两部份，外藏有全部自治权。北京政府申斥了它的全权代表，对条约不予承认，而英、藏双方承认此条约有约束力。

达赖还想独揽西藏内政大权，他以不便办事为理由置喀厦政府于不顾。他提高行政效率，一度废除死刑，认为不合佛教教义，采取措施改革财政，逐步削减三大寺院的权力。他声称只有他才有封官授爵之权，可以分封土地并改变官爵的性质。过去这些官爵是世袭的，现在只及于本身。他作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所有官员和喇嘛寺院院长均由他任命。不听命的僧侣将处以极重罚款和教规的制裁，喇嘛寺院和贵族的经济特权均加以限制，增加的税收，一部分用来装备军队。1917年底，中国军队在西藏东部发动进攻，为藏军大败，被赶出前所占领的地区。达赖提出每年增募军队，藏军将增加一万一千人，总数达到一万七千人。

北京政府重新企图恢复清朝时代的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为此目的，1919年和1920年先后派代表团去拉萨。看来主要由于英国给达赖政府以支持，代表团无结果而回。1920年秋，英政府应达赖及其政府之请，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拉

萨，这是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代表团由贝尔率领，在拉萨住了十一个月。他向达赖重叙旧情，并表明英国政策的目的：西藏应有国内的自治权，西藏的自主权将对印度的安全起防御的缓冲作用。

二十年代初期，达赖和班禅之间逐渐出现裂痕。他们都是被捧得具有唯我独尊的性格，平时很少会面。班禅于1904年、1910年两次受清政府的册封和邀请，达赖对此耿耿于怀。班禅虽然都未接受，但清政府两次提请却使他成为一个取得西藏大权的可能竞争者。1913年1月，达赖回拉萨后批评班禅在达赖流亡时期与汉人的合作，及他在辛亥革命后没有积极设法把汉人逐出拉萨。达赖是坚决反汉的，他愿意为了西藏的利益而亲英、亲俄。班禅虽然反对西藏的内部政策，但也不积极亲汉。双方的矛盾因为达赖要对班禅治下的日喀则、丹吉林寺增加税收而复杂化了。达赖为了要实现他的计划开辟新税源的办法使他与班禅发生了冲突，他建立一支西藏正规军的努力也遭到教内一些人的反对。达赖强向班禅逼索财物和粮食作为税款，班禅于1923年11月化装逃离西藏。班禅1925年初到达北京，北京政府热烈欢迎，并准备认他为西藏统治者的候选人。达赖曾多次抱有让班禅回藏的想法，但由于西藏内政方面的考虑而未能实现。

到1925年，达赖折衷主义外交政策的弱点表现得很明显了。他奉行一个以夷制夷的政策维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但一直没有能建立起一个牢靠的对外关系体系。他开始改变西藏的政策由英国转向中国。他任命了一个反英的军官为司令官，英国在拉萨的势力迅速下降。据说1927年和1928年曾有蒙古客人来到拉萨，英方查明那是苏联的间谍。1928年班禅派代表到南京致敬，并希望南京政府能全部管理西藏事务。1930年通过蒙藏事务委员会的汉藏混血种、年方二十二岁女译员刘曼卿，进行了一般性的礼节交往。拉萨方面于1922年派驻北京雍和宫的贡觉仲尼于1930年回到西藏，携有南京国民政府试探达赖达到和解的八项建议。达赖提出他的建议，其中有以承西藏自治换取过去的藩属关系的设想，以及恢复西藏旧日边界等项目。

经交换意见后，达赖派代表去南京，南京方面亦于1931年派代表团带着恢复西藏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具体建议去拉萨。但在代表团在离拉萨一天路程时，国民政府代表谢国梁突然死亡。同时又发生了些新问题使拉萨与南京建

立关系的微妙情况趋于复杂，那是1930年的所谓大金寺事件。当时汉族军队与藏族喇嘛曾在江孜发生冲突，进而发展成为藏军和当地军事长官刘文辉的所部长期战争，拉萨派军增援以维持藏族的地位。1932年及1933年拉萨与被国民政府划入西康和青海的藏东两地区签订了停火协定。

达赖由于工作劳累、两次长期流亡的艰苦生活，西藏地区又缺少医疗条件，1931年神谕预示其不享天年。1933年12月17日，达赖死在拉萨。这一日恰好是藏历十月的最后一天，据西藏说法这是一种凶兆。1934年1月，热振寺主热振呼图克图被选为摄政。他就职后立即向南京当局报告，并请求其承认。这是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当局第一次提请中国政府的任命。南京方面马上同意。

达赖十三世是为数不多的亲临西藏行使权力的一个达赖喇嘛。在这一方面， he 可以与那位伟大的达赖五世罗桑甲错（1617—82）相比，他在十八世纪与中国合并之前统治着这个国家。尽管有过种种国内外的重大困难，达赖十三世靠着辛亥革命的间接影响，在排除汉族在西藏的影响上取得了成功，并在一个时期内给他的境内带来了实际上的独立。

达赖喇嘛的第十四次转世继承了十三世，但他在1959年逃亡了。因此，可以说达赖十三世是西藏最后的一个神权的统治者。贝尔自1920—1921年率领英代表团出使拉萨后退休，他对达赖曾有同情的叙述。贝尔（即后来的贝尔爵士）写了一本《西藏的过去和现在》（1924），献给达赖十三世。贝尔在临死前不久，写成了《达赖传》，于1946年出版。

德穆楚克栋鲁普 汉称：德王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蒙古西苏尼特右翼旗郡王，汉称德王，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

德王为蒙古西苏尼特右翼旗郡王之子，出生于内蒙锡林郭勒盟。他在绥远一个中学读书，后到北京进蒙藏学校。1919年袭父爵为西苏尼特郡王，1921年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他还是一个称为蒙古青年党的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主要人物。

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内地上过学，希望在中国民族体系结构中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自从外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另一个内蒙民族主义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于1925年成立了。它的目的是通过革命实行民族自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德王等人希望孙逸仙《建国方略》中所规定的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利得以实现。但是国民政府的对蒙政策并不给内蒙古的蒙族以更多的政治权利，而将内蒙改为所谓的特别区，分为察哈尔、绥远、宁夏三个新省。同时，又怂恿汉人侵占牧地。在这种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内蒙的民族主义运动迅猛发展。

在蒙族各党所关心的地区中，察北的锡林郭勒盟受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最小，很少有汉族进入该地区。德王是内蒙古最有声望的首领。1930年前后，他在东自西满、西到绥远的鄂尔多斯地区、激起并加强反对汉族的活动。

1931年秋，日本侵占满洲，对内蒙来说也增加了一种新的外来武力威胁。当日本军队巩固在满洲的统治后，在那里建立了满洲国，将六个蒙族盟中的三个盟包括进去。国民政府无意反抗日本的侵略，德王等人准备保卫自己的领土。

宋哲元是当时察哈尔省主席，德王作为西苏尼特旗的郡王，成为省政府委员。蒙族人知道他们不能指望汉族的省政领导人会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因此，1932年冬，德王率领了一批王公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内蒙的行政机构。蒙族代表在南京完全未受重视，他们一怒离南京并发表抗议书，后来又由北平回内蒙时发表了另一份抗议书。他们的离去，促使南京重加考虑对策，1932年12月，任命班禅喇嘛为蒙藏事务委员，以西陲宣抚使的名义去内蒙百灵庙抚慰蒙族，使其继续向南京效忠。但班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对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府的主张，任命德王为滂江守备委员，并予以训练蒙族军队的一定权力。

1933年8月，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4月底，侵占在锡林郭勒盟边境的察东多伦，准备把满洲西部或内蒙东部的蒙族纳入一个新行政区——“兴安”，名义上是满洲国这个政治结构中的一个自治单位。这对南京方面和锡林郭勒盟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压力，但南京方面对此并无反应。日军侵占多伦后，南京取

消了原来同意德王一再的要求在滂江扩建蒙族军队的计划。德王除了是西苏尼特旗郡王之外，还是锡林郭勒盟最有势力的人物，该旗名义上的统治者云王，年逾六旬，身体衰弱。

1933年春，德王及其伙伴，采取行动实行自治。德王最亲密伙伴之一是乌兰察布盟长云王，他侄子是德王之友又是他的内蒙自治要求的坚决支持者。1933年5月，西蒙各领袖由德王、云王主持，在百灵庙开会，讨论内蒙形势。日军的压力不断加大，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察南也沦入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当局在多伦成立了一个自治县。察北的锡林郭勒完全陷于孤立，夹在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1933年7月26日，在百灵庙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西蒙独立问题。大部分蒙古王公不赞成宣布独立，据说这是由于班禅施加了遏制的作用。8月14日，西蒙各王公电南京宣布他们打算成立自治政府，电报以索王领衔，在他之下即系德王。

内政部长黄绍竑和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被派往内蒙制止自治运动。石青阳未能使各蒙族领袖平息下来，黄绍竑则连劝说蒙族领袖与他在张家口会见也未能做到。

1933年9月，蒙族首领又在百灵庙开过一次会，10月9日至24日，组成了内蒙自治政府，新政府仍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汉族省行政长官不得干预。1933年10月22日云王当选新政权的首脑，德王被委主持政务局（委员会）。

百灵庙团体派出德王亲信之一包悦卿（赛音巴雅尔）去张家口，准备与黄绍竑会商。南京指派一个以黄绍竑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去内蒙，辅佐以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和一些专门技术人员去内蒙。1933年10月21日，黄绍竑离南京，在北京滞留了几天，10月29日到达归绥。那时百灵庙会议已休会。

黄绍竑派出了十人代表团去百灵庙和德王等人谈判。德王也派出代表去归绥，表明蒙古的立场，并说明实行自治的目的在于团结蒙族共同抗日。两人多次电报往返，但在互相谅解上并未取得进展。德王认为问题相当重大而又复杂，双方实有会商的必要。

11月10日，黄绍竑去百灵庙会见云王、德王及其他蒙族领袖。云王是名义上的蒙族首席代表，主要发言人却是德王。据德王说日本人曾向蒙古人商洽准

备建立一个统治内蒙全境的“蒙古”国。他又提到有人指责他曾与日本方面磋商。倘以此而论，认为他曾这样做的话，那他就没有向南京提出申请这个问题的必要了。他又说，过去蒙古四分之三的地区已沦入俄国、日本之手，因此有必要考虑紧急措施来保卫剩余的四分之一的土地。尽管黄绍竑作了一些让步，但他断然说明，南京政府不容许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最后，班禅从中调解，蒙古方面放弃了要求自治的主张，并提出两种方案，黄绍竑接受了其中的一种。

黄绍竑、班禅回到南京后，1933年12月，国民政府对协议做了修改。1934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了百灵庙会议所商定的形式，而删除了实质部分，分歧再度出现。但这一次蒙古在讨价还价中较为有利，因为溥仪决定于1934年3月1日登满洲国皇帝之位，日方又与内蒙重新交往。蒙方要挟说，如果南京方面不接受其要求，那他们将不得不对满洲国和内蒙古的联合一事做认真的考虑。

南京取消了1934年1月的那项决议，2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议决议成立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3月7日任命云王为委员长，德王为政务局局长（秘书长）。委员会于1934年4月23日成立，各级人员于5月1日就职。

这项协议不久便证明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日军对内蒙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其东部，满洲国察东驻防司令李守信把司令部从多伦迁到沽源。6月末，土肥原大佐率关东军进入内蒙，促使蒙族领袖们认识日本权力的不可抗拒和宽大。

土肥原的目的未能立即实现，蒙族人士仍希望和南京方面所签订的协议使他们获得所想要的自治权。但国民政府既未按照约定拨给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经费，又拒绝装备蒙族军队。1934年9月3日，南京特工人员在北平绑架了德王的参谋长，并将他处死，说他是日本间谍。

此时，百灵庙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盐运和商务通过蒙境加以阻挠。班禅继续充当调解人。早自1934年8月以来，德王就和日方公开谈判了。他对察哈尔省当局的一个代表团说过，蒙族之是否效忠南京，决定于南京之能否逐渐执行“明确的政策”，并采取“妥善措施以援助内蒙”。

国民政府这时正忙于剿共，它在日本的压力下，倾向于接受在华北建立一个“友好”政权，对内蒙则不加援助。1934年11月，云王、德王曾去归绥会见

蒋介石，蒋介石这时正致力于新生活运动和其它国内事务，对蒙族领袖不甚重视。

1935年，日军势力已扩大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地区；12月，国民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实上正式承认华北形势的改变。德王这时已完全倾向于日本方面了，日本同意他的政治自治，同时又不引起剧烈社会变动的条件下，给他以有效的支持。德王并不是天真到不知道日本人有其自己的军事战略利益，但是到1935年冬天，他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了。

1936年1月中旬，南京方面指责德王宣布内蒙独立。1月21日，德王向南京正式否认这项消息。但是日本方面已向德王提出任务，叫他召集蒙族领袖开会宣布内蒙独立。1936年2月，他们在百灵庙开会，参加者都了解到，脱离中国而独立那就是完全投靠日本。

锡林郭勒盟紧邻热河，盟长索诺木拉布坦亲王在1933年10月的会议上支持德王的，但对德王说明，倘因此而发生“事故”，他将率全盟离去。索王此时带走了锡盟十个旗中的八个旗。随他而去的还有和伊克昭盟各旗（地处绥远，在省主席傅作义治下）及乌兰察布盟的两个旗。他们在归绥傅作义的庇护下，另行成立蒙政委员会。当时德王手下只有锡林郭勒两个旗，云王的乌兰察布四个旗及察哈尔的爱玛（部）。

德王迁到德化。1936年4月他和他的追随者在德化开会成立军政府与日本合作。6月28日，内蒙政府在德化正式成立，日方给德王和云王派有军事顾问代为训练军队，开始扩建军队。

1936年8月中旬，德王去百灵庙，办理政务会的结束事宜。8月13日有人行刺，次日即回汾江原来的驻防司令部，他对国民政府敌意更深。9月，他和他的部下及日本方面会商，准备进攻绥远。

1936年11、12月间，满蒙联军在日军顾问及装备的支援下，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计有兵力约一万人。但绥远的中国防御意外之强，11月19日，中方军队攻占百灵庙，缴获大批军械文件，据说以此证实了日方准备扩充其在内蒙的势力，并进而控制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西北及新疆等地区。1936年12月21日，德王宣布停战，国民政府经此次胜利，任命傅作义、阎锡山和伊

克昭盟的沙王在百灵庙另行组成政治总部。

国民政府宣布德王为卖国贼。1937年1月18日，德王自任在德化早已于1936年6月成立的内蒙政府主席。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德王的骑兵随同日军一起作战，很快就占领了绥远。1937年10月，日军在归绥召开会议，宣布绥远脱离中国独立。然后日本建立了一个绥远蒙族自治政府，与已在察南和晋北建立的蒙族政权平行。1937年11月，他们又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总部设在张家口，作为日本包办的三个蒙古政府的管理和协调机构。

1937年12月，蒙疆联合委员会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首府在归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为军事部长。归绥政权采用新旗和新历，由成吉思汗即位起纪元。1938年云王死去，德王任主席。1939年9月，首府迁往张家口。德王后将骑兵指挥权交给了李守信，本人则专心致力于维护蒙古利益的事务。

内蒙政权名义上和当时北平的临时政府地位平行。自从1940年日本包办的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德王的政权就被置于南京政府之下，但事实上，1940年以前和以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要是听命于日本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一直把东西内蒙分别治理，东蒙仍属西满的兴安省。德王及其追随者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独立。

1945年，国民党、共产党、内蒙蒙族和外蒙蒙族在日本军事力量转让，及苏、蒙军队进入满洲及内蒙所形成的新权力圈中竟相争夺地位。德王逃到南京，他的妻儿为苏蒙军队俘获带走。德王会见蒋介石，和他讨论战后的内蒙问题，但他发现蒋对蒙族的问题，并不比他早先更为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德王获准回华北，在傅作义的监护下在北平过着退隐生活。

德王在北平一直住到1948年底。在共产党解放北平之前不久，德王飞往宁夏省定远营，他和达王商议，准备动员阿拉善旗、额济那旗的蒙军抵抗迅速向西北推进的共产党军队。不久德王又飞往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广州，他提出为了加强达王和他本人的地位，给内蒙以自治，便于增强他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地位。他和代总统李宗仁会商无结果，但他的要求将记入档案。